

新聞教育與我

傳播叢書 3



中華民國大眾傳播教育協會
編印/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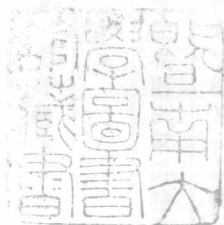
G 219.29
854

港台書室

501033

新聞教育與我

傳播叢書 3



中華民國大眾傳播教育協會
編印/出版



90095441

新聞教育與我

編 印：中華民國大眾傳播教育協會

發行人：馬 星 野

總編輯：鄭 貞 銘

出 版：中華民國大眾傳播教育協會

會 址：臺北市環河南街2段133巷6號

電 話：308-6396

印 刷：中興印刷廠

地 址：臺北市雅江街26號

電 話：(02) 331-6611
361-0089

定 價：新臺幣伍拾元

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誌第2553號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九月出版

新聞教育與我

緣起

中華民國大眾傳播教育協會的成立，不但希望從事大眾傳播教育與大眾傳播事業的人士，透過此一組織，坦誠合作，更希望使我國大眾傳播教育邁進新的境界，使新聞學府爲新聞事業培養更多傑出的新起人才。

因此中華民國大眾傳播教育協會出版叢書，其目的在：

——推動大眾傳播教育與實務的配合；

——加強大眾傳播教育與三民主義相結合；

——促進大眾傳播工作人員的專業知識與專業道德；

——促使大眾傳播事業配合國家及大眾利益；

——普及大眾傳播學有關知識；

——推廣有關大眾傳播教育與大眾傳播理論的研究；

我們希望我們的努力能獲得大眾傳播教育界與新聞事業界的共鳴與支持。

中華民國大眾
傳播教育協會 謹識

「新聞教育與我」目錄

我從事新聞教育經過	馬星野	一
臺灣新聞教育之開拓	謝然之	一五
——從復興崗經木柵到華岡的創建歷程		
新聞教育二十五年的回顧	黃天鵬	三七
無限的敬意與懷念	吳俊才	五
作始也簡	曹聖芬	七
——母校新聞系創辦的回憶		

政大新聞教育的創始成長和現狀 徐佳士 七

半世紀記者生涯 何名忠 一〇一

從沙坪壩到浮圖關 袁睽九 一三三

——記中央訓練團新聞研究班 黃天鵬 一三五

我從事大眾傳播教育的回憶與感言 董彭年 一三三

師長的教誨與社團的實習 石永貴 一三九

我從事大眾傳播教育的回憶 丁維棟 一四九

癡執教鞭念六秋 戴華山 一五七

復興崗上「蹉跎」記 葉建麗 一六五

「橋」的回顧 鄭貞銘 一七三

——華岡十三年憶往

我從事新聞教育經過



馬星野 浙江平陽人

作者簡介

現任中央社董事長、大眾傳播教育協會理事長。

曾任駐巴拿馬大使、政大新聞系主任、中央日報董事長、中央通訊社社長、中央四組主任。

我從事新聞教育經過

馬星野

離國五年（民國四十八年到五十三年）歸來，我由外交界轉回了新聞界，有如回到我的家裏。每當我接近新聞教育的環境，我就像回到我自己的書房和寢室一般地親切。這也許是因為我曾在新聞教育的園地裏，耕耘了十五年，我關切它，也更珍視它。因此，我願意把我從事新聞教育的經過，和我對新聞教育所持的觀點寫下來，提供給有志接受新聞教育和從事新聞教育的人參考。

先辦報後學新聞

三十五年前，我從中央黨務學校（國立政治大學的前身）畢業後，就擔任「黨

軍日報」主編，那時候的南京，真是年青人的世界，像我才十九歲，就包辦了報紙的大部份重頭工作；寫社論，作標題，還編報。這許多工作充實了我辦報的經驗，也提高了我對新聞事業的興趣。

民國二十年春天，中央政校校長就是先總統 蔣公，計劃派六名學生到國外研究教育和經濟，我參加考試錄取了，但是我對教育沒有太大的興趣。剛好那時的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孔祥熙送了兩頭石獅子給美國密蘇里大學，密大的新聞系主任華特·威廉博士（Dr. Walter Williams），也到北平，在中國燕京大學演講，並有密大與燕大交換學生的計劃。因為我辦過報，有興趣研究新聞，政校當局也認為新聞學很重要，同意讓我改科，不學教育而學新聞。

民國二十年八月，我離開上海坐船去美國，進入歷史最悠久，名氣最大的密蘇里大學研究新聞。他們很歡迎從東方去的學生，准我入新聞系三年級就讀，於是，我就成為中國國立大學派到密大研究新聞的第一個學生。

在密大讀了三年，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冬天畢業，原準備到哈佛大學研究，但是哈佛沒有新聞研究所。當我得到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研究所的入學許可時

，政校來電報要我回國。民國二十三年五月我回國了。

從教選科到辦新聞系

二十三年七月的一天，政校蔣校長召我去，他問我：新聞學好了，回國做什麼事？我說，辦報。他老先生笑笑說：辦報很重要，但是辦報沒有人幫忙是不行的，現在中國好的記者太少，應先訓練一批新聞記者，以後幫你辦報。我非常贊同這個指示，立刻興緻勃勃地寫了一篇「蔣介石先生會見記」，在胡政之先生主辦的「國聞週報」上發表。最近我還在政治大學圖書館裏看到這篇文章，現在看起來雖然覺得很幼稚，但仍可見當時我的心情是多麼興奮愉快。我決心辦新聞系訓練學生，也就從這時候開始。

我到政校教書時，還很年輕。教務主任羅家倫先生怕學生轟我，讓我在外交系四年級開「新聞學」選修課程。他說：四年級的學生快畢業了，是不會轟老師的。二十三年九月，我開始教書，在這一班同學中，有很多人才，以後駐巴西及越南大使許紹昌，就是其中的一個。

「新聞學」在政校是第一次開課，大家覺得很新鮮，半年教下來，同學們不但不轟我，而且對這門功課發生了興趣。第二學期就擴大範圍，列爲外交、政治、法律、經濟四系的選科。經過一年的試驗，政校當局認爲可以單獨成立新聞系了。

新聞教育十五年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明令政校辦理新聞系，培植新聞人才。九月，新聞系成立，當時規定：凡是在政校各系讀完二年級的學生，可以轉入新聞系，第一屆的學生有十個，現在大部份都在臺灣。像現任中央日報董事長曹聖芬、文化大學夜間部新聞系主任彭河清、大華晚報董事長錢震、前中央銀行秘書處長邵德潤、前新聞局顧問王漢中、前中央日報人事室主任馬志鏢等。

那時候，在南京請新聞學方面的教授是很不容易的，政校新聞系除了由我自己擔任一些課程外，許多老師都是從上海請來的。我當時認爲，新聞學需要許多其他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和語文學科來陪襯，所以我對新聞系課程的分配比例是：社會科學佔百分之五十，人文和語文學科佔百分之二十五，新聞專業科目百分之二十五。

新聞是離不開實際的，當時的政校新聞系沒有足夠的經濟能力辦一份日報，給學生們實習，於是就辦了一份雜誌，叫「中外月刊」，由十位同學負起編印的責任。好在校內有印刷廠，十位同學的國文根底又都很好，辦起來也就順利多了。我主持這份刊物，同學們分門別類去編。當時我們採行的制度很有趣，一方面仿風行美國的雜誌「現代史料」，把國內外分成幾個區域，每一位同學負責一個區域的問題研究，每期刊十篇文章，每人寫一篇；另一方面，我們又仿時代雜誌（TIME）的格式，第一期的封面，是用阿比西尼亞（衣索匹亞）皇帝塞拉西，因為，當時他決定派兵抵抗違反國際聯盟約束，進兵侵略阿比西尼的墨索里尼大軍，而成爲當世英雄。很奇怪，這本雜誌一出來，立刻成爲南京銷路最大的雜誌，當時南京的「時事月報」也比不上我們，「中外月刊」已與上海的許多著名雜誌，像「東方雜誌」等並駕齊驅。

政校新聞系第二期的學生，只有八位，但都很優秀。像曾任中央電影公司總經理龔弘、前中國廣播公司總經理黎世芬、曾任中央日報總經理的凌遇選、研究東南亞問題的專家朱鶴賓、前臺灣省新聞處長周天固等。

這第二批學生，除了接辦「中外月刊」外，還參加了其他校內的活動，使新聞系成為政校最活躍的一系，而博得「政校的騎兵」的讚譽。（騎兵是軍校中最活躍的份子，超過砲科和步兵科。）

第三期，正值對日抗戰，學校播遷，學生的數量大受影響。這一期只有三個學生，除了曾任中央日報總編輯與中華日報副社長的林家琦外，其餘兩位都已去世，他們是曾任中央社駐泰國特派員黃印文和中央社編譯鳳申。

第四期也是在播遷中渡過，由南京而牯嶺，經芷江、貴陽到重慶，八位同學也都很優秀：其中徐鍾珮，是政校新聞系的第一位女生，也由於她的堅毅奮鬥，才打破了新聞系不招收女生的傳統。其他同學有曾任駐美公使駐哥倫比亞及澳洲大使沈銓、曾任聯合報駐美國特派員香港時報董事長毛樹清、曾任聯合報資料主任黃宣威、大華晚報社長耿修業和卓越的翻譯人才現中央通訊社社長潘煥昆等。

政校新聞系曾一度改辦新聞班、新聞科及新聞學院。畢業學生有前中央日報駐紐約特派員中央第四組主任陳裕清、英文中國郵報社長余夢燕、曾任政大新聞系主任王洪鈞、曾任中央社編輯部主任周培敬等。勝利復員以後，政校新聞系又恢復了

，並擴大。

從民國二十三年到三十一年，我沒有離開過新聞教育的園地，整天與學生在一起播種、灌溉。

我是在民國二十五年結婚的，婚後，我的家庭一直和學校在一起，無論是牯嶺、芷江，還是重慶。學生常到我家來，一起討論、聊天。上課時，我們是師生；下了課，我們就是朋友，感情融洽，無所不談。其間，很多同事、教授，離開學校，或經商，或從政，唯有我仍留在學校。

民國三十一年，重慶大轟炸過後，抗戰進入艱苦階段，當時的國民政府主席，也就是先總統 蔣公，鑒於新聞宣傳的重要，特派張道藩先生出任中央宣傳部長，他原是政校的教育長，出任中宣部長後，要我主持新聞事業處。陳故副總統當時任湖北省主席，也邀我到湖北恩施去。最後，我接受了中宣部的職務，暫時卸下政校新聞系的系務；但我沒有放下這支握了將近十年的教鞭。

我對新聞教育的看法

追溯我熱衷新聞教育，培植新的新聞記者人才的因素，可從三方面來說明：

(一)民主政治的需要：我國在數千年前對主張「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等人民至上的政治哲學，再經過幾千年的歷史、政治、哲學家的提倡，中國必然要走向民主的路線。民主政治的成功，是基於「政府一切措施要根據人民的好惡和需要」，否則，必然失敗。國父說：「政治就是管理衆人之事。」民主政治就是人民來管理衆人之事。但是，我國有十億以上的人口，凡事都要十億人自己來管理是不可能的。因此，國父主張權能分開，政府有權做事；政權（選舉、罷免、創制、複決）由人民行使。要使人民適當運用政權，必須讓他們知道每天發生了些什麼事？訓練他們發表自己對這些事的意見，以及怎樣發表意見？人家對這些事又持什麼樣的意見……，這都需要靠報紙等傳播工具的力量。所以說，沒有新聞自由，就談不到民主政治。美國的總統傑佛遜的名句：「寧可活在有報紙而無法律的國家，不願活在有法律而無報紙的國家。」也就是這個意思。

當人民能够發表意見時，法律才不致成爲約束和壓迫人民的工具。相反的，如果人民對一件事只知道一些片斷，既不清楚又不完整，那就猶如戴上了有色眼鏡，

所看到的是模糊的，不明確的，而且帶有色彩。

真正能夠向人民報導事實真相的，是報紙、廣播、電視……等，這些傳播工具等於是人民的耳目。然後，人民的意見，再透過報紙、廣播、電視的評論、通訊、讀者投書，發表和反映出來。

所以，要真正達成爲民喉舌、爲民耳目的使命，促成健全民主政治的實行；就必須要具有負責、尊自由、有修養、道德高、觀察力強而正確以及能明確反映民意的新聞記者，來報導事實。因此，造就一批優秀的新聞記者，是當前國家實施民主政治最迫切最重要的事。這是我從事新聞教育的第一個理由。

(二)新聞事業現狀的需要：當我於民國二十三年創辦政校新聞系時，中國的新聞事業還非常落伍，甚至於經過八年抗戰，三年還都，新聞事業在數量上仍然不够普遍。以大陸之遼闊，五億以上的人口，據當時較正確的統計，全國日銷報數不超過兩百萬份，平均每三百人才有一份報紙；而且，報紙的銷區並不普遍，三分之二以上，都集中在上海、天津、北平、廣州、重慶等少數幾個大城市，其他地區限於人力、物力，極不普及。同時由於工商業不發達，廣告少，若干地區，即或有報紙，